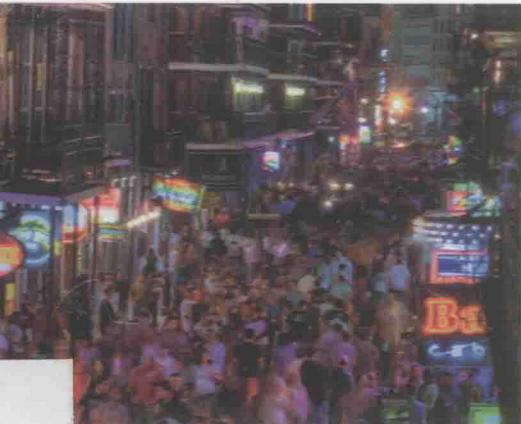


一部浓缩了漫长金融泡沫历史的经典之作。

——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斯



**The Go-Go Years :The Drama and
Crashing Finale of Wall Street's
Bullish 60s**

华尔街：泡沫岁月

[美] 约翰·布鲁克斯 (John Brooks) ○著

龚华燕 龙雪飞○译

The Go-Go Years

The Drama and Crashing Finale of Wall Street's Bullish 60s

华尔街 泡沫岁月

[美] 约翰·布鲁克斯 (John Brooks) ⊙著

龚华燕 龙雪飞〇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新世纪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华尔街：泡沫岁月 / (美) 布鲁克斯著；
龚华燕，龙雪飞译。—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405-6333-2

I . ①华… II . ①布… ②龚… ③龙… III . ①股票市场—研究—美国 IV . ① 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4837 号

THE GO-GO YEARS: THE DRAMA AND CRASHING FINALE OF WALL STREET'S BULLISH 60S by JOHN BROOKS Copyright © 1973,1999 by John Brook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EIJING GuangBan New Century Culture & Media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人：孙泽军

策 划：李江南

责任编辑：宁 伟

特约编辑：张宝婕

装帧设计：揽胜视觉

技术编辑：张 波

华尔街：泡沫岁月

[美] 约翰·布鲁克斯 著

龚华燕 龙雪飞 译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5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5-6333-2

定 价：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调换：

北京广版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010-65542969

华尔街：泡沫岁月

序 Preface »»

“可以想象，本书也许将成为关于‘华尔街’时代的最后著作之一。”约翰·布鲁克斯在他关于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的名作中，以这句话作为结尾。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一预言的结局。关于华尔街的书籍一再问世，层出不穷。自1973年本书出版以来，关于华尔街的书籍可以装满一家小型图书馆。仅仅在过去数年中，我就见到过大量书籍的手稿、大纲或出版意向书，内容涉及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美林（Merrill Lynch）、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和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等。如今，只要是关于金融的书，没有哪一本会因被视为不重要或构思不当而不能出版。

这种现状一部分归责于布鲁克斯本人。在率先证明外行也能涉足华尔街的新闻记者中，便有他的一席之地。这些记者写出了翔实的长文，首次让受过通识教育、并无专业知识的外行也能轻松读懂。《华尔街：泡沫岁月》便是这样一本书。

关于华尔街的书籍，有这样一种趋势：读者常会掩卷叹息，事物越是改变，越会保持原样。（这就像布鲁克斯毫无疑问会对他的《纽约客》（*New Yorker*）老读者们表示的那样——“万变不离其宗”。）本书大量内容证明了这一点。随着股市一路飙升，一些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观察家所熟悉的角色登上了舞台。60年代富达基金（Fidelity）出了蔡志勇（Gerald Tsai），90年代富达又出了杰夫·维尼克（Jeff Vinik）。而对冲基金创始人琼斯（A. W. Jones）房间避开众人，在他的后继者乔治·索罗斯的身上至少也

看到了这种特点。在20世纪60年代的市场，人们拼命捞钱，90年代如实再现。“在商业伦理根深蒂固的美国，”布鲁克斯写道，“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存在强大的内在稳定机制，足以使人们能够拒绝新的生意，而眼看着竞争对手抢走。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宁愿面对混乱，暂时赚得盆满钵满，也不愿少赚一点而维持长远的秩序和理智。”

不过，对于今天读这本书的人来说，最有意思的是20世纪90年代与60年代的市场差异。例如，在这本书中，没有能与今天的科技股真正对应的东西。没有国外市场，没有债券，基本没有计算机。另一方面，在今天关于华尔街的著作中，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证监会）、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纽约证交所）及老派阵营等几乎不值一提，却在布鲁克斯的书中有大量的描写。

再谈谈本书的道德问题。本书相当清晰地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离奇道德事件：罗斯·佩罗（Ross Perot）一天之内损失4.5亿美元；虽然远未尝试，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竟敢考虑收购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埃迪·吉尔伯特（Eddie Gilbert）虚假制造公司繁荣，诱骗一些富人投资他的企业，最后同其他输家一样躲到巴西。现在看来，他们是多么温顺！至少对本人来说，他们已经没有能力让人感到吃惊。显然，作者认为他笔下的人物陷入了永无止境的堕落和救赎的循环。但当代的读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谁堕落了，为什么他需要救赎。在这些有关道德的故事中，至少有部分道德是缺失的。

这也许有助于解释本书最令人奇怪的特点：它的语言基调。那些可爱的、复杂的长句子〔为便于阅读，中文版本将这样的句子翻译成了简洁、流畅的短句。——译者注〕，作者布鲁克斯的眉毛弯成的漂亮曲线。他可以感到，你，温和的读者，拥有广博学识，本能地反对这些……投机者……布鲁克斯的声音，首先是老派阵营的声音。他想象的读者，正是在过去30年从金融世界消失的轰动一时的角色。今天，华尔街有谁会对投机三思而行？有谁会反对大公司收购？没有，或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人，也一定生活在偏僻的孤岛，从未听说过股市的消息。

最后，阅读本书的方式，应该不同于读其他华尔街经典著作。读

这本书，不是为了看看今天的形势在过去的重现，仅仅是名称不同。读这本书，是因为它对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事物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如果布鲁克斯认为老派阵营的终结意味着华尔街的终结，导致他偶尔误判，至少也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华尔街作为一个社会的命运被终结，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机械化。”他在本书即将结尾时写道，“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大量的股票交易不是在天窗下的交易厅面对面进行，而是相隔成百上千、成千上万英里，坐在闭路电视荧屏之前进行……显然，华尔街日益无力处理全国证券业大规模扩张的业务，迫于这一点，废除股票权证、用计算机记录的趋势日渐强烈。……华尔街将把自己转变成毫无人格的全国性自动售货机，也许，这对投资者会更加公平，但作为美国的一个微观世界，它将乏味得多。”

这一描述完全正确，他的预言却大错特错。经过短短的25年时间，华尔街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微观世界。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

目 录

序	I
第一章 戏剧高潮	1
第二章 公平交易	21
第三章 最后的盖茨比	45
第四章 繁荣时光与不安的躁动	66
第五章 北方的曝光	84
第六章 Go-Go的诞生	102
第七章 联合企业财阀	121
第八章 可怕的后台	146
第九章 正午的狂欢	165
第十章 冲突	181
第十一章 滑铁卢前的狂欢	207
第十二章 1970年大崩盘	231
第十三章 挽回体面	246
第十四章 泡沫的岁月	273
参考文献	280

第一章

戏 剧 高 潮

1

1970年4月22日，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亨利·罗斯·佩罗（Henry Ross Perot）正当40岁。尽管他已跻身美国最富有的少数几个人之列，但因为新富不久，尚未登上《普尔氏公司名录》，在《美国名人录》露面也才是头一回。在他家乡也只有少数人听说过他。许多碰巧在飞机上坐在他邻座的人，既未觉得他有何特别之处，也没觉得这人有趣。他身高勉强有5英尺半（约1.68米），眼神天真率直，笑容勉强，鹰钩鼻子，操着得克萨斯东部山区的口音，平头修剪得一丝不苟，一谈起诸如爱国主义和美国童子军等话题，就滔滔不绝，热情洋溢。总体上，他更像一名充满前途的不错的年轻后生，很可能正在做推销员。

然而，就在这一天，佩罗身上发生的事件，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金融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件事很难说让人羡慕，但肯定会让人大吃一惊。这一天，他的股票投资在账面上损失了大约4.5亿美元。当然，他在账面上还剩下近10亿美元，但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他在这一天的损失，超过了除美国五大慈善基金以外任何慈善基金的总资产，超过了除纽约以外美国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预算——也超过了J. P.摩根

(J. Pierpont Morgan) 1913年去世时的世人所知的财产，而且不仅是金额上超过，实际购买力也如此。而就实际购买力而言，很有可能，自工业革命为私人大量积累财富以来，任何人一天之内遭受的损失也比不上这笔巨款。

2

这一天是地球日。最近一段时间，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人关注的热点，其中尤以年轻人为甚。以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 (Gaylord Nelson) 为首的一群环保领袖挑选了4月22日作为地球日，以此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污染。(像罗斯·佩罗这样在股市拥有的荒唐的巨额账面利润，是否也被视为一种形式的污染？相当可能。) 在华盛顿，1200名年轻人聚集在内政部大楼。他们高喊着：“远离石油！”“停止污染！”抗议政府给石油生产商签定合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厂商的生产将造成污染。纽约、芝加哥和费城都举行了反污染集会，参加人数达2.5万人甚至更多。(后来人们了解到，联邦调查局进行了监视。) 在明尼苏达州布卢明顿市，前副总统汉弗莱敦促联合国建立一家环保机构，以应对全球污染，而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伯奇·贝赫 (Birch Bayh) 则呼吁美国建立一家全国性的机构，来“像征服太空那样征服污染”。此时，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 (Walter Hickel) 正在家乡阿拉斯加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这是位公认的环保英雄，他很快就会因自己的观点而遭受事业上的牺牲。在纽约市区，孩子们骑自行车上学；在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第五大道，人们心旷神怡，欢呼雀跃；在第17街，人们从长达一个街区的聚乙烯管中呼吸“纯净的空气”；如此等等。舆论宣传和公关的炮火顷刻间完全转向了一个以往不熟悉的方向，无特征可循。就在同一天，在提及尼克松总统有关不愿成为第一个输掉战争的美国总统的讲话之际，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评论道：“他可能成为第一个输掉一个星球的美国总统。”

与所有这些坚定的决心和高涨的热情相对照的，是自美国南北战争

以来最悲观的情绪，使这一年的4月更加阴云笼罩。5个月前，对越南美莱村的大屠杀首次曝光；就在同一天，4月22日，纽黑文市发生支持黑豹党的骚乱性罢工，并很快蔓延到东北部所有大学校园；8天之后，美军骇然入侵柬埔寨，遭到国人反对；12天之后，发生国民警卫队枪杀肯特州立大学学生惨案。在这种阴霾之下，又有种种迹象表明，全国经济衰退正在逼近，股票市场因而一片恐慌。尽管这场恐慌远没有结束，却已经在很多方面堪与1929年10月的恐慌相提并论。在整个1969年，道琼斯普通股工业平均指数几乎在一路下跌；在次年坚守3个月之后，道琼斯指数无奈崩溃，到4月22日，已经比16个月前到达峰值时低了235点。然而，比这糟糕得多的是，道琼斯指数只说明了部分问题。利率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导致房地产新项目倍受压制，大多数工业发展项目因而变得不切实际。在国际市场，美元处境不妙，外国人持有的美元数量，已经超过美国黄金储备总值数十亿美元。华尔街100多家经纪公司濒临破产。至于道琼斯指数，这个在由敏感而准确地反映市场动向的老牌蓝筹股组成的指数，如今对股市形势的反映却如此苍白，大打折扣。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70年5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股票每一股的市值总和，仅仅约相当于1969年年初的一半。1967年和1968年那些市场领涨股纷纷从巅峰陡然坠落，它们分别是大型联合企业、计算机租赁公司、新技术电子公司以及特许经营企业。这样的公司下跌的幅度，并不像道琼斯指数那样是25%，而是80%、90%或者95%。所有这些，正是1929年发生的种种，它们预示着另一次大萧条的到来，而这一次的诱因，既有绝望情绪，又有各种经济因素，因而是真正的萧条。

商业领域和金融领域的表现，显然与1929年如出一辙，这足以让人们不仅赞同桑塔亚那（Santayana）的观点，也赞同普鲁斯特（Proust）的看法。前者是美国批判实在论的倡导者，他曾说，忘记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后者是法国作家，他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从某个角度来看，似乎通篇都在说，人类要从经验中学习，不过是幻想。

在1929年大崩盘之前，金融专家们一再重申，不可能再出现1907年那样的恐慌，因为联邦储备制度发挥着保障作用；在1969—1970年大崩

盘之前，同时代的专家同样反复表示，1929年那样的恐慌不可能重演，因为联邦储备制度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证监会）发挥着保障作用。在这两次崩盘之前大约8年，都出现了市场暴跌（分别是1921年和1962年），随之而来的便是更加无节制的投机。在这两次崩盘中，都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急切地最大限度利用公众对股票永不满足的胃口，用最少的现金，建立起摇摇欲坠的巨大金融金字塔体系。1929年之前，它们被称为投资信托公司或控股公司；现在，它们被称作联合企业。在这两次崩盘中，都出现了这样的操盘手，公众视若明星般奉为金融先知。20世纪20年代，杰西·利维摩尔（Jesse L. Livermore）几乎被公众赋予预测股价的超自然能力。而60年代，这个人物便是蔡志勇。

在这两次崩盘中，都有一些掌握内幕的人利用内部消息和高超的市场技巧，操纵股价，欺骗公众；20世纪20年代，这些人被称为合伙经营者，60年代，他们被称为投资经理。（20年代和60年代高回报基金的运作即使没有违法，但也显失公平，但奇怪的是，公众只要能从中赚钱，便没有对其中任何一种形式提出异议。）在这两次崩盘中，道德的松懈都始于华尔街边缘被忽略的角落，并最终波及权力与名誉的中心。1926年，未来的纽约证交所总裁开始逐步挪用托管的基金（尽管十多年后此事才曝光）；1929年，大通国民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行长通过卖空该银行的股票，个人净赚400万美元。60年代华尔街的当权者中，并没有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恶行，或者说，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不过在1926年，J. P.摩根公司的一名合伙人公开吹捧通用汽车的股票，而他的公司本身与通用汽车有着很大的利益关系，这震惊了整个金融界，此前，金融界人士认为摩根家族是受到了上帝的庇护；40年后的1966年，华尔街经历了同样的震惊，因为就在这一年，人们得知，两年前，J. P.摩根公司与担保信托公司合并后成立的摩根担保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的一名重要副总裁，在不到半个小时内买进或授意买进了1万股得克萨斯海湾硫磺公司（Texas Gulf Sulphur）的股票，显然是因为掌握了该公司在加拿大安大略发现了储量巨大的新矿的内部消息。

还可以在某些有意思的细节上继续进行对比。在这两次市场大崩盘

中，总统都是共和党人，且都是在经济一路繁荣到达顶峰时期当选，都强有力地支持商业发展。在这两次危机中，总统都在白宫与华尔街领导人物多次召开精心策划和宣传的会议。最后，两次崩盘都导致了疯狂的相互指责。

当然，这两次崩盘也存在巨大的不同：不仅仅在于后者并没有导致灾难性的全国性经济萧条（虽然也确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在于方式、细节及社会意义的差别，这也正是本书的主题。在比较1929年和1969—1970年的大崩盘时，人们甚至能够发现卡尔·马克思名言的正确性，即：历史第一次重复时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3

1970年春天，在“地球日”及罗斯·佩罗“暴跌日”之后不到3个星期，华尔街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场。5月6日星期三，在美军入侵柬埔寨后一周以及肯特州立大学惨案后两天，全美80所大学因学生和教职员罢课完全停课，另有300多所学校的学生罢课。纽约市的大部分中小学和大专院校计划于5月8日停课，以表示抗议，而这些学生的反战示威游行中，有一场计划在华尔街举行。6日，来自纽约几所医科和护理学校的一小群师生前往华尔街进行和平示威游行。在那里，他们受到了三一教堂牧师唐纳德·伍德沃德（Donald R. Woodward）的热忱欢迎。这位年轻的牧师充满活力，热爱和平。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师生们建议，鉴于华尔街地区白天人流庞大，可以在三一教堂成立午间急救中心。由于三一教堂自殖民时期以来就坐落在华尔街的一端，尽管看上去它往往并非是华尔街的精神中心，但地理上却正处在金融区的心脏地带，因而，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师生们说，如果三一教堂愿意提供场地，他们将自愿负责成立急救中心，并配备急救人员。牧师充满感激，热忱地接受了这一提议。急救中心启动的第一天就是5月8日，回想起来，这一巧合简直是天意。

周五早上潮湿、寒冷，飘着毛毛细雨。纽约的5月初经常如此。大约

7点半，数以百计的男女学生便开始从华尔街的两个主要地铁站涌出，分别是位于大通曼哈顿广场的第七大道百老汇站以及位于百老汇与华尔街交汇处的莱克星顿大道站。他们大都来自纽约大学、亨特学院和各所公立中学，这些学校都在这一天停课。最后，人数超过了1000人，全都涌向金融区的中心广场，即百老汇和华尔街的交汇处举行示威。一大群警察严阵以待，对他们严密监控。但学生们似乎无意给制造警察麻烦。细雨霏霏中，整个上午，在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的联邦大厅立柱下，在摩根帝国曾在里面几乎一统国家的大理石建筑威严的大门前，他们振作气势，提出自己的要求。毫不奇怪，这些要求与一些激进的青年领导人几天前在纽黑文市的秘密会议上达成的意见一致，如今正在美国东北部数十所大学的校园里传开。第一，美国立即从越南和柬埔寨撤军。第二，释放国内所有“政治犯”。显然，这是指因被控参与虐待和谋杀亚历克斯·拉克利（Alex Rackley）而入狱的黑豹党成员，前者也是黑豹党成员，被指曾经向警察告密。第三，停止一切美国大学资助的、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工作。与1970年春天的多数学生游行不同的是，这一次完全是非暴力的。事实上，现场情绪相当稳定，中午雨过天晴，温暖的太阳普照大地，大家的情绪甚至更好了。大部分示威者都在人行道上坐下来聆听演讲。

11点55分，突然，从广场的4个入口同时涌入了大量头戴安全帽的人，就像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他们是建筑工人，许多受雇于附近庞大的世界贸易中心工程，褐色的工作服和橘黄色的安全帽看上去像是制服。他们许多人拿着美国国旗，其余人则拿着建筑工具，穿着厚重的靴子。人们很快明白，他们打算以此为武器。后来，据说有人在通过手势指挥他们的行动，指挥者是两个人，头戴灰帽，穿灰色套装，身份不明。这些人可能有200人之多。

在他们冲过坐在地上的一群群学生时，其目的昭然若揭：一是把国旗插在联邦大厅（也称国库分库大楼）门前华盛顿雕像的底座上；其二是瓦解游行，必要时可使用暴力。为了第一个目的，他们一边向雕像行进一边高喊：“前进，美国！”“不爱她，就离开她！”在台阶上，他们受

到了少数警察的阻挡；然而，他们在人数上占有压倒优势，警察很快被搡到一边。国旗被成功地插到了雕像下面。另一方面，这些建筑工人们不断用棍子、拳头、靴子、起子和钳子攻击学生。在金融区的狭窄街道上，男男女女的学生尖叫着被他们四处追赶打伤。三一教堂前门上，代表刚刚建立的急救中心的红十字旗也被他们撕下。空气中充满了愤怒的吼声和伤者惨叫，弥漫着血腥暴动的不祥气息。勇敢的伍德沃德牧师自始至终一直手无寸铁地站在三一教堂前门，引导伤者去里面的急救站；由于害怕那些人冲进教堂，他曾两次下令关上大门。

三一教堂里面正在举行圣餐礼——弥撒祈祷正在进行当中，以悼念肯特州立大学的遇害学生和越南战争中的逝者。大家先是听到从街上传来的骚乱声越来越大；接下来，随着圣餐礼的进行，他们看到不断有学生流着血走过中殿边的通道，或者被抬着进入圣器储藏室和牧师更衣室，年轻的医生和护士已经等候在那里为他们救治。总共有大约50名游行者在三一教堂的急救站得到救治，另有23人因伤势过重被送往比克曼市中心医院。

此后一个多星期，华尔街每天遍布警察，仿佛这里是个法西斯国家。

这场小规模的激烈的冲突，如此近距离地浓缩了那一刻美国的悲剧——在这起悲剧中，无论以什么的角色，职业的华尔街，金融和法律的华尔街，权力和优雅的华尔街，似乎都站在学生这边。也许是出于普遍的人性，也许是出于阶级情感，浸染在华尔街的牛市和熊市里的人们，觉得与自己更近的是鸽，而不是鹰。在交易大厅，莱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出身高贵的合伙人罗伯特·伯恩哈德（Robert A. Bernhard）在试图保护一名被殴打的年轻人时受到了袭击，一名建筑工人用钳子把他的头部打成重伤。往北几个街区，建筑工人高喊：“打死共产党杂种！”一名年轻的华尔街律师上前抗议，他被推倒在地，遭到拳打脚踢。不过，大部分华尔街的权势人物，无论是否共产党人，都没有参与这场争斗。他们并不在华尔街头。与1920年的著名华尔街爆炸案一样，1970年的骚乱也正好发生在正午前，而非午餐时间。1920年，据称是无政府主义者制造的惨案曾导致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当时，在街

上喧闹之际，高楼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说拥有一扇窗户的每个人）都看着窗外。市场并没有受到影响，从高高的安全的窗口，华尔街工作的大部分精英目睹了那场屠杀。

实际上，他们确实也几乎别无选择；即使冲下来加入混战，也无济于事。然而，这一天，职业的华尔街扮演的看客角色却极具象征意义，他们心知肚明地同情弱者，同情那些手无寸铁的和平爱好者，但是却袖手旁观。他们从窗户向下观望，充满惊奇和恐惧。（从他们的角度，）这些窗户远眺着美好的上纽约湾，那里座座岛屿绿意盎然，邮船来来往往。而往下看，却是狭窄的街道，街道上传来孩子们刺耳的哭喊声，他们或是受了伤，或是受了惊吓。

4

这起事件，就像佩罗虚幻的命运一样，使得人们开始关注新时代华尔街与美国关系，或者说关注两者之间并无关系这种事实。当孩子们在窗外尖叫，这里的人却在玩着纸面游戏，这样的生活，这样高高在上的生活，还有意义吗？有没有哪个人听到卡车正驶向远处嘎嘎作响的革命的断头台？无论如何，如果1970年你是一名华尔街人，至少你已经不能从战争中直接谋利。直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股市都习惯于踌躇满志地迎接战争新闻，尽管可能没有喜形于色，但对和平新闻，却表现出惊慌失措和歇斯底里，华尔街称之为“和平恐慌”。然而在1967年底某个时候，华尔街开始认定，越南战争不是一桩好生意，于是它打破先例，果断地在战争时卖出股票，在和平时买入股票。获得防务合同的企业不再是蓝筹股，而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洛克希德公司很快将面临破产的危险。1968年初的多项和平计划，就导致了，或者说有助于成就了创造历史成交量的大牛市，这是一种前所未闻的现象。华尔街旧日的不光彩一面结束了，有良知的金融家舒了一口气。

或者，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华尔街人，你可以告诉自己，你正在为工业扩张提供金融服务，而工业扩张将有助于缓减贫困，并最终消除

贫困，这便是你正为进步所作的贡献。但现在你已经知道，或者最近被迫反思，工业扩张并非只有有利的一面；每一家新的工厂，不论多么现代化，消毒多么彻底，在为许多人带来新的财富的同时，由于对环境的污染，也都可能意味着丑恶、痛苦和死亡。

除了在莫斯科和北京尘封的档案里，华尔街早已不是政治问题，即使美国的老左派也都早就停止攻击华尔街（很可能早已投入股市）。“华尔街的走狗”，也是一种受到嘲笑的说法，还不如说“蒙特卡洛的走狗”。企业和联邦日益富有，权力不断上升，已经把华尔街变成了没有重大政治影响力国家设施。新左派干脆就视而不见，唯一的例外是在1967年，当时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同他的雅皮士朋友突发奇想，从观光走廊上向证券交易所的地面扔钞票。几个月后，交易所的管理层尽职尽力，特地在观光走廊周围安装了防弹玻璃，似乎要表明，他们认为扔进去的钞票属于杀伤性武器。（也许没错，毕竟从交易所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简言之，有人嘲讽华尔街，而华尔街却小题大做。但这种嘲讽甚至都并非针对华尔街，华尔街已经成为商业化美国的方便的代名词。难怪霍夫曼曾经得意洋洋地表示：“向证券交易所的地面扔钱是一种很纯粹的信息，它的含意不言自明。它的内容比成千上万的反资本主义手册或文章还要丰富。”这些防弹玻璃又是多么郑重其事地强调了这一段话！这一次，鄙视傻瓜的华尔街，却遭到了愚弄。

在整个暴风骤雨般的1967和1968两年，一切正在分崩离析，似乎美国这个世界的中心真的已经把持不住。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美元在巴黎已经不能兑换，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芝加哥民主党大会发生丑闻，学生骚乱升级，而愚蠢的股票市场却一路高歌猛进，毫无顾忌地扶摇直上，仿佛诸事顺遂，或者一切都会变好，就像7月日本甲虫节里疯狂、无知而又快乐的甲虫，又像一个在劫难逃的人在享受最后的晚餐。人们不禁要问：难道精明的华尔街对究竟在发生什么毫无察觉？

除此之外，华尔街难道不正是在生动地象征和体现着一切？新教徒的职业道德，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中心论和拜金主义，这一切，美